

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

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,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李大钊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,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,努力探求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路径。他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、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等认识,是党的历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,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

李大钊同志(水墨画)

李大钊自幼年始即接受传统文化教育,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,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知。自会说话始,祖父李如珍便教其读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经》等启蒙读物。1895年,李大钊入私塾,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,前两位塾师皆以博学闻名乡里,第三位老师是出自国子监的鸿儒黄玉堂。他们的悉心教导使李大钊成为颇有名气的“文童”。李大钊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儒学典籍,“写得一手好诗文”,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。清政府实行新政后,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。1905年,李大钊进入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。在这里,他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知识,同时也继续研习儒学典籍,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不断加深。

正是长期系统的学习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知,奠定了李大钊文化观的基础。在李大钊看来,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“已尝有伟大之贡献”。数千年来,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,无论是儒家思想和完善的制度体系,还是科技发明和中医药学,都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珍宝。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文化品格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虽历经劫难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,正如李大钊所说“天道未改,种姓犹存”,其中饱含着他对中华文化深深的自信和褒扬。

深受传统文化濡养的李大钊,一生践行中华民族仁爱忠信的文化价值观。他曾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名学生梁容若题写著名的“横渠四句教”：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李大钊不仅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青年时代,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,他便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。辛亥革命后,面对封建军阀篡夺政权、共和政体有名无实的现状,他奋力发出自己的“隐忧”和“大哀”。他忧国之所忧,哀民之所哀,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,下定决心为挽救“神州陆沉”“再造中华”而努力奋斗。

1913年,李大钊到日本留学。此时的日本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,他也由此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悟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“静”的文明,西方文明是“动”的文明,这是东西方文明的“根本不同之点”。在他看来,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,“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”,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。

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期间,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,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“君学”,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。李大钊主张“打倒孔家店”,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,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“专制政治之灵魂”的孔子形象,根本目的在于否定封建君主制度、建立现代新国家。他对孔孟学说也没有一概否定,而是辩证地看待,以求解决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。他认为,孔孟之道中有很多能助于个人修养和符合建设现代新国家的部分,应继续发扬光大。譬如,他推崇孔孟的“实践”主张及“自重”的个人修养精神。“但学其有我,遵其自重之精神……”他也推崇儒家忠恕思想,甚至将其与西方的“自由平等”思想相提并论,认为根据儒家忠恕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学说来修身养性、谨慎自持,最终就可以“养守法循礼之习惯,而成立宪绅士之风度”。尽管李大钊为着“科学”“民主”的目标迫切要求破除孔孟之道的桎梏,但他仍然认为总的来说,东方这种海纳百川的“静”的文明能够使西方人变得更深沉、更有内涵,“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”。

新文化运动时期,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,一派主张“全盘西化”,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。李大钊则科学地规避了他们的片面性、机械性。他既不赞成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,又不赞同拘泥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派,而是理性地认识到两种文明虽性质不同,但具有互补性。东西方文明一主动一主静,“正如车之两轮,鸟之两翼,缺一不可”。东方文明应该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“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”。同时,东方文明又能够使

西方文明除“物质”之外,增添“精神”气质,“宜斟酌其物质的生活,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”。他还指出,有志之士应使西洋之“动”的文明融会于东洋“静”的文明之中,“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,而别创一生面”。李大钊对融会、调和西方文化充满自信,这是因为他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认识,也与他客观、理性的态度和辩证、科学的方法有关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,“科学万能论”也受到广泛质疑。著名哲学家杜威(美国)和罗素(英国)都主张用东方文明抑制西方文明中的物欲、暴力和战争,以期“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”。中国许多文化界名人亦纷纷提出用东方文明来疗救西方文明,例如梁启超、梁漱溟等。梁启超写了《欧游心影录》,抨击西方文明和“科学万能论”。梁漱溟则出版了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提出了“世界文化的未来,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”。李大钊指出,西方这种“疲命于物质之下”的文明“不无趋于自杀倾向”。

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,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。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,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,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。他提出,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“俄罗斯无产阶级文明”是世界“第三新文明”,且是拯救世界的凭借、法宝,“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,不足以渡此危崖”。李大钊在深入研究“第三新文明”后,对根据中国社会“实境”吸收、应用这一新文明解决中国的问题充满信心。他于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中指出:“一个社会主义者,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

发生一些影响,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。”民族文化是“实境”的构成要素之一,只有从“实境”出发,根据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、民情风俗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,才能真正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,才能真正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、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武器。为此,他号召“把三五文人的运动”变成“劳工阶级的运动”,也十分重视农民,号召知识分子去做“开发农村的事”。

李大钊由一位对民族文化有着深刻认知的传统读书人,到理性地主张融会、调和西方文化,再到根据中国“实境”吸收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的“第三新文明”,连续发表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《庶民的胜利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《新纪元》等文章和演讲,热情讴歌十月革命,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,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。他指出,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,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“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”,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,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,考虑中国的问题,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,他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。他指出,马克思主义“是一个时代的产物”“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”;社会主义“用以为实际的运动”时,它会“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”发生“适应环境的变化”,是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的。这些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探索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,对于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据《人民周刊》袁咏红/文

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抛洒激情 收获梦想
这火树金花 不夜天呦
把咱们的幸福照亮

打树花 蔚县 任志国